

读史札记

过墨者藏奸

□ 滴水水

宰相是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天下行政事务。按理说身处此位不可能天天三缄其口。可中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宰相,嘴上像是贴封条似的,尊口难开,说话极为谨慎。一位是五代后唐的宰相马胤孙,另一位是北宋的宰相王珪。

公元934年,后唐李从珂杀闵帝自立为末帝,不久即任马胤孙为宰相。马胤孙居相位,从不决断政事。他的秉相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用相印办政事;见客口不开,遇见上下左右不开口谈论国事;归宅门不开,到家后大门紧闭,拒绝见任何士大夫。因长久如此不开印、不开口、不开门,时人讥他为“三不开宰相”。

王珪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登相位,十几年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可他从来不发自己的意见,上朝执事,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说“取圣旨”。皇帝表态后,他不问正确与否,恭敬回答“领圣旨”。退朝之后,见到部下,便说“已得圣旨”。他为相行政就是这套“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的固定程序。时间久了,人们便给他起了个“三旨相公”的绰号。

马胤孙、王珪如此作相,朝政可想而知。马胤孙时的朝政,任人摆布,他对什么事都不置可否,关键时刻像木头桩子,居相位坐看国家灭亡。王珪为相,“无所建明,率道谏将顺”,而且心思极为谨慎,遇到有才能的人,变着法子进谗陷害。《宋史》记载,宋仁宗宴宴文阁作飞白书,分赐众臣,命王珪写上分赐大臣的名字和年月。欧阳修得到了仁宗的字,王珪却借机打压,除了仁宗让他写的名字和年月外,在绢书的最后写上了“翰林学士王珪奉圣旨题”,让欧阳修非常不耻。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例给神宗进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肖,难以追陪新进”之类的文词,神宗不满,朝臣进谗,遂有“乌台诗案”,王珪乘机进谗,找了苏轼的所谓“反诗”,挑出“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蜃龙知”等句,向神宗进谗,说神宗已登大位,那有“蜃龙”之说,苏轼分明有二心。好在几个重臣为其申辩,否则苏轼将命丧黄泉。宋神宗想要收复被西夏占据的灵武,王珪唆使俞允上平西夏策,并指挥调度实施此策,结果惨败。《宋史》说:“永乐之败,死者十余万人,实珪启之。”“三旨”宰相就是这样行政而掌管国事的。

马胤孙、王珪身居相位,如木偶孤立,是因为才疏学浅,昏庸所致吗?不是。五代十国科举松驰,文人不断追求进士及第。马胤孙凭自己的学问,鲜见地考取进士。因为他有学问,文章又写得好,后晋、后汉的文臣武将都很敬重他。他还写过一篇有名的《槐虫赋》,借槐树上的白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和志向。从五代史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家兼佛学家,有着很高的天赋。王珪则更是一个学问大家。“珪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他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欧阳修认为他是“真学士也”。他以文学进用,深受同僚推崇。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他的手。从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宋神宗曾说:“王珪有体,他学士不逮远矣。”曾撰《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四库全书》辑有《华阳集》四十卷,是北宋有影响的文学家。可见,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然而,才学学识成了他们窥时局、权利弊、投机钻营的重要支撑。

从《资治通鉴》《宋史》和新旧五代史中可以看出,他们如此不言慎行,貌似呆木,其实深藏心机。五代时期,政局复杂多变,朝廷官员朝不保夕。李从珂的朝堂,内有冯道、卢文纪等人的明争暗夺,外有节度使石敬瑭等人的虎视眈眈。为摆脱凶险,规避麻烦,马胤孙装聋作哑,慎权慎行慎言慎行,为的就是能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三不开”,他在救死不顾的年代,却毫发无损,老死于户牖之中。王珪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经受过拒拟宋宗传位诏书之险,看到无数朝臣相互倾轧之凶,久涉险恶朝堂,他深知只有按皇帝的旨意办事,才是最牢靠的,唯皇上龙头是瞻,绝不袒露私衷,才能万无一失,让自己稳坐相位。

身处高位,在复杂的环境中,慎言慎行,是明智之举。但是,谨慎到唯唯诺诺、虚怀躬身、不分是非、呆若木鸡的程度,一定是心怀鬼胎,不是光明磊落、心怀社稷之志。要说揣摩圣意,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大将曹彬,应是非常典型的。但是,他揣摩圣意,是为了把握好军事战略和行事方向,绝不徇私谋利,赵匡胤认为只有他不欺主瞒上。曹彬曾对朝臣们说:“人生何必作使相,好官职也不过多得些钱罢了。”是的,马胤孙、王珪就是为了多得私利,保全私利,才“三不开”“三旨”的。要说沉默寡言,孙权时期的宰相顾雍非常典型。他在朝堂上很少陈述自己的观点,可孙权说:“顾雍不说话,只要说了言必有中。”顾雍不言,绝不是为保相位,而是为了让自己把问题想透研究透彻,然后会想把想法告诉孙权。顾雍是个墨者,但不“过墨”,而是作为宰相,言必稳当准确。

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说过:“过谦者怀诈,过墨者藏奸。”看马胤孙、王珪的所作所为,大师之言一语中的。

许德佑烈士: 献身古生物事业的镇江籍科学家

□ 霍义平



许氏创孔海百合



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2001年的一天,美国西南部圣地亚哥港口轮船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突然,海关电话铃声大作,报告说,从集装箱里发现了大量走私化石。经查验,它们均来自中国,整整93箱,共计14吨。海关随即查封。中国国家文物局获得消息后,立即与美国海关总署联系,要求按照国际惯例,无条件归还。经过不懈的交涉,这些珍稀化石终于追回。这批化石共有100多件,全部出自贵州,包括10条贵州龙化石,1条兴义龙化石以及部分已经碎裂的鱼龙化石,其中数量最多、尤为珍贵的是海百合化石,共有89块。国家文物局决定把这批珍贵化石交由北京自然博物馆收藏。200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为此举办了《海百合化石展》,这次展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把珍贵的海百合从学术界推向了收藏界,从而步入了民众视野,而且勾起了人们对发生在80年前震惊全国的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献身古生物事业惨遭杀害的往事。

许德佑,镇江丹阳县人,1908年12月8日生,兄弟五人,排行老五,幼年就读乡里,禀赋过人。省立苏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兼修社会科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中学同学陈鲤庭友善,经陈介绍,加入田汉、洪深办的南国社,担任过导演。1930年大学毕业在二哥许德凯的资助下留学法国,入蒙伯里大学攻读地质学,1935年获地质、古生物双硕士学位,加入法国地质学会。当年回国,进入中国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无脊椎动物研究组主任,主要研究湖北的三叠纪地质,后转而研究西南地区的三叠纪古生物,十年间共21次赴野外工作,发表中外文论文29篇,著有《贵州三叠系之几个剖面》《滇黔公路东段地质》《贵州三叠系》等专著,1940年获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纪念奖金,翌年兼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42年,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1944年获丁文江纪念奖金,是名重一时的三叠纪地质专家。作为中国三叠系地层研究的先驱者,当时学界戏称他为“许三叠”。

1944年4月初,许德佑等应邀到贵阳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周年年会,会期4天,会议的主角是李四光和许德佑。第一天由李四光带队

在乌当洛岩察看贵州第四纪冰川现象;第二、三天由许德佑带队观察贵阳附近的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等地质现象;第4天举行报告会,由李四光和许德佑先后主讲《地史及地壳之认识》与《贵州海百合化石》,听讲者众,气氛极为热烈。会议圆满结束后,受地质调查所派遣,许德佑偕陈康、马以思(女)等赴贵州西部勘察地质,路经晴隆县境内,遇见土匪,歹徒发现许德佑等几位外乡人“行装颇多,购物多用新钞”,于是见财起意,“乃议行劫”,选择在入烟稀少的晴隆花贡镇附近伸出了毒手。许德佑突然被土匪开枪击中,子弹由腰穿腹而出,当场牺牲,时年37岁。继而陈康、马以思也不幸遇难。三位正在野外从事地质考察的科学家在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贵州省,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噩耗传出,立刻引起科学界的极大震动和激愤,全国上下,一时朝野震动。在抗战时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科学家仍然心系国家矿业发展,为地质调查埋头痛苦,而生命安全却不能得到保障的悲惨经历,引起国人关注。各界人士义愤填膺,愤恨匪盗猖獗横行,痛惜地质精英惨遭祸祸,国家损失卓越才俊。案发后,为使凶手伏法,遗属孤寡获得抚恤,伸张正义,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中央地质调查所侯学煜研究员等人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社会资源,最终,这桩惊天动地的要案中的29名匪徒悉数逮捕,其中被陆续伏法者达24名,匪首因拒捕当场被击毙;许德佑等获国民政府最高等级明令褒扬,遗属孤寡获得抚恤;贵州省主席、普安县长县署长辞职。

为了纪念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科学家献身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分别以三位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了纪念奖,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曾获得过该奖。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长眠于今贵州工业大学附近,1986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时,贵州省相关部门,曾将三位烈士的墓园加以整饰,重立碑文,常年有民众前来进行祭奠。镇江烈士陵园亦将许德佑英名收录于烈士名册,近年还开展了网上献花等祭奠活动。

鉴于许德佑对中国三叠纪地层的突出贡

献,1949年,经古生物学家穆恩之先生鉴定,把许德佑在关岭发现的海百合化石,用其姓氏定名为“许氏创孔海百合”。

海百合是棘皮动物中最古老的种类,因酷似百合花而得名,它是动物,并非植物,大多生活于400-500米深的清澈水中,喜欢群居,其根固着海底,构成所谓的海底花园。世界上海百合化石主要集中于德国的阿尔卑斯山和中国,其中中国贵州出土的海百合化石最为系统。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当年献身的地方-贵州关岭和贞丰等地晚三叠系地层中保存的海百合化石相当完整,尤其是关岭地区的海百合化石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分布范围较广。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关岭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2006年9月正式开放。公园埋藏的化石形成于距今二亿二千万年前(晚三叠世)的海湾环境。主要包括:鱼龙、菊石、楯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及海百合、菊石、腕足类、鱼类和陆生的古植物化石。属种繁多、藏量丰富、保存完好、形态精美,完整地记载了古代生物大复苏的信息,为国内外同期地层所罕见,堪称世界一流,是最有希望破解古生物从灭绝到复苏之谜的区域,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园内辟有专区介绍许德佑等三位科学家的事迹,以供后人缅怀和纪念。

海百合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其苛刻,完整化石存世极其稀少,非常珍贵,同时,它也是一幅巧夺天工的艺术品,花朵越大的其晶体亮度越强,收藏价值越高。2006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珍品藏家转让一块长2米、宽1.2米的海百合,转让价格就达到1200万元。广东省博物馆于2010年开馆,馆内珍藏了一块海百合化石,高3.2米、宽2.6米,作为镇馆之宝,价值约为8千万元。一块长4.8米、宽1.9米,总面积达9.36平方米的世界最大海百合化石在贵州石文化艺术馆展出,当地市民大饱眼福。这块化石上因为有15朵许氏创孔海百合和21朵关岭创孔海百合,价值连城,其中最大的单株冠部直径超过40厘米,堪称国宝。我市南山、五州山、十里长山和高丽山等山区的石炭系底部地层中也有海百合及腕足类生物碎片存在。

陈庆年为柳氏写的三篇传记

□ 尤志心

陈庆年祖父经商致富后,欲在后代中培养出文化名人,遂与镇江文化大家族柳氏结姻。陈庆年又拜柳泉(柳诒徵父亲)和两个舅母为师。经过陈氏、柳氏三代人的合力培养,陈庆年后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名人。陈庆年后又尽力培养柳诒徵,柳诒徵在史学、教育、图书馆事业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陈庆年的事业。两人都是“只讲学不做官”尊儒重教的爱国学者,是研究近代史不可避开的人物。

陈庆年曾为柳氏写了三篇传记。柳兴恩是柳氏十世子孙,是柳诒徵的族祖父。柳兴恩(1795—1882年),字润江,精谷梁学。谷梁学即研究《谷梁传》的学问。《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是战国时期谷梁赤撰写。此书是解释《春秋》的三传(另二传为《左传》《公羊传》)之一,是儒家经典之一。缪艺风(荃孙)认为清末治谷梁学诸家中,柳兴恩“规模独大”。光绪丙戌(1886年),学使(即学政,又叫督学使者。清朝官名)王益吾辑刊《皇清经解读篇》,得兴恩

书稿,因稿墨凌乱,嘱陈庆年校对整理,并为之补苴。编定30篇。在编定后,陈庆年作《柳兴恩传》。

柳兴恩有个胞弟叫柳荣宗(1802—1865年)字德斋,号翼南,口吃,高度近视,但性敏慧,把卷就目,上下数过,一简已终,明于视者不及也。书法不师一家,小楷大字莫不古雅绝伦。又好朴学,讲经学,著有《尚书解诂》《左氏春秋旧谊》及《骈韵》,惜未刻。又著《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已刻。后来兴恩(原名兴宗)和荣宗兄弟两人均在《清史稿·儒林传》中,被称为大学问家。故陈庆年又作《柳荣宗传》。随后,陈庆年又为舅母柳宾岫(名旭,十二世,精医术,善书法,1822—1887年)作传。传名《母舅柳宾岫先生传》。上面三传均收入《横山乡人类稿》第九卷。《京江柳氏宗谱》收入《柳兴恩传》和《母舅柳宾岫先生传》,而《柳荣宗传》则收了兴恩作的《胞弟翼南传》。

柳兴恩、柳荣宗两人能收入《清史稿·儒林传》,也是陈庆年推荐的。当初修《清史稿》时,清

廷曾拟请陈庆年主修。陈因健康等原因,固辞之。但答应为《清史稿》提供史料。后来,陈庆年提供的史料,不仅内容丰富,且翔实,受到了好评。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对先生所供史料,评为:“精金美玉,为李、钱、缪三氏著述所未尝著录,此非读书破万卷,并胸中有线订书者,乌能办此?”“征送各书选择极精,无一不与史事有益。盖惟史才,乃知史材。”(引自陈登善著《陈庆年年谱》)

注 ①赵尔巽(1844—1927年),字公夔,号次珊,汉军正蓝旗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陕西等省布政使,署理山西巡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署湖南巡抚,是年冬奏准将湖南阜湘、沅丰两矿务公司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垄断全省采矿、炼砂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湖南的矿权。倡导教育改革,将长沙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及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1914年,北京政府委为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为“二十六史”。

被淡忘的节日 ——上巳节

□ 郑学富



民间流传说:“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轩辕生。”三月三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诞辰日。三月三古称“上巳节”,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

远古时期的农历三月初三,最主要的活动是祭祀高禘。高禘是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因供于郊外又称“郊禘”。“禘”通“媾”,有牵线搭桥,成人之美的意思,因此上巳节又是求偶节、求子节。上巳节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情人节;三月三正值桃花盛开又称为“桃花节”;古代汉族少女到了15岁,要于此日举行成人礼,即“笄礼”,所以也称为“女儿节”。

远在周代,就有水滨祓禊之俗,朝廷指定专职的女巫掌管此事。《周礼》曰:“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祓除指三月三到水边或浴,以除不祥;衅浴是用芳香的草药涂身(或熏身)并以和汤沐浴洁身。

到了汉朝,三月上巳确定为节,每逢该日,官民都去水边洗濯。不仅民间风行,连帝王后妃也去临水除垢,被除不祥。《后汉书·礼仪上》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洁)于东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灾,为大絮。”

到了魏晋时代,上巳节逐渐演化为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们临水宴饮(称曲水宴)的节日。《荆楚岁时记》载:“士民并出江渚池畔浴,为流杯曲水之饮。”宗旨是祈福免灾、欢娱娱乐。由此而派生出流传千古的习俗,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雅事——曲水流觞。众人坐于环曲的水边,把盛着酒的觴置于流水之上,任其顺流漂下,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历史上最有名的曲水流觞是晋永和九年(353年)在兰亭举办的那次。那天“天朗气清,惠风习习”,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偕同亲家、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和高官名士、家族子弟共42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清溪旁修禊祭祀仪式后,又以引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饮酒作诗,其乐融融。据载,在这次游戏中,有11人各成诗两篇,15人各成诗一篇,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并挥毫作序,乘酒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唐朝时,上巳节非常热闹繁盛,长安城内男女老少身着盛装,来到曲江畔宴饮、郊游踏青。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三月三日之上巳辰,……唐朝时,曲江,倾都袂袂踏青。”达官显贵则樽壶酒浆,彩旆翠辇,匝于堤岸。笙歌画船,宴乐江上,鲜车健马,比肩击鞞。许棠在《曲江三月三日》诗中描绘了满城士庶倾城而出、争先恐后的景象:“满国赏芳辰,飞辇复走轮。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鸟避连云帽,鱼惊远浪尘。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皇宫的后妃们也不甘寂寞,争相出宫游乐。杜甫《丽人行》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璿金孔雀银麒麟。”

宋朝以后,三月上巳风俗渐渐衰微,宋代由于尊崇理学,之后的文献不见上巳节男女爱情的记载。清明、上巳二节相邻太近,有时日期甚至重合,踏青春游等习俗并入了清明节,上巳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曲水流觞风俗仍然流传下来。明清时期,京城北京建有流杯亭多座。乾隆帝有诗曰:“白石清泉带碧萝,曲流贴贴泛金荷。年年上巳寻欢处,便是当时晋永和。”

